

许忠代表：打破运营和地域壁垒

上海要建立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

“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。顶级文化演出不仅能拉动票房，更能带动城市文旅消费，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。”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提出，要建立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，打造上海“歌剧之城”。同时，要让音乐积极拥抱AI技术，进一步繁荣文化演艺市场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

许忠认为，统一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有着迫切需求。目前，全国歌剧市场存在创作人才缺乏、场馆运营低效、观众基础薄弱、传播声量有限等诸多问题，而全国主要歌剧市场的各自为战，则加剧与放大了这些问题。“歌剧作为世界通用的文化纽带与消费经济的重要潜在增长极，歌剧行业亟须通过一个互惠互利、同心同德的全国演艺大市场。”

上海拥有发展歌剧演艺市场的优良基础。许忠给出了一组数据——2025年，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演出10677场，拥有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兼具艺术价值和市场热度的精品剧目，演出收入3.8亿元，线下观众349.78万人次，其中，歌剧类演出占比逐年提升。“歌剧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，一座城市与歌剧的相遇，它既是城市国际化实力的证明，也是驱动城市活力的引擎，上海应成为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的倡议者、共创者、引领者，建立完整严谨的工作机制体制，同时依托自身资源优势，打造歌剧之城。”就此，许忠建议，首先是借鉴目前歌剧系统运营成功案例，打破桎梏，激发活力。

他指出，上海应率先打破纯事业单位运营壁垒，推行“公益性+市场运作”模式，赋予院团

经营自主权；建立市场化人才考核与激励机制，吸引国内外歌剧人才，并进一步整合剧场、院团、文旅资源，打造歌剧创作、演出、衍生品开发的全产业链。

“上海要建立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，还应打破地域壁垒。”在许忠看来，歌剧作为文化项目，需坚持“内容为王、人才铸魂”，在目前客观条件下，上海应建立全国歌剧演艺资源联动机制，重点加强与北京等演艺重镇的合作。“通过每年开展跨年交流演出80场，涵盖经典歌剧与原创剧目；艺术人才互访200人次，开展创作、排练、舞台技术等领域的深度交流；年度共享交流剧目30部，其中原创剧目占比不低于40%，实现优质资源全国流通。”

“剧院还应积极拓宽视野，拥抱群众，充分与AI等技术手段结合，升级剧院排期、票价制定、资源配置等管理方案。实践上，还应将自身打造成为美育、文化的社会教育基地，推出轻量化歌剧选段、艺术导赏等内容；同时，应充分与文旅合作，利用网络直播等互动方式扩大影响力，结合上海文旅特色，推出‘歌剧+文旅’体验线路，培育多层次歌剧观众群体。”许忠给出具体路径。

与此同时，中华文化与歌剧艺术也可以深度融合，通过全民艺术普及，丰富人民精神文



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剧照。

青年报资料图

化生活，让歌剧唱响文化新声，讲好中国故事。许忠说，打造“歌剧之城”还能有效促进艺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，推动艺术普及与文旅融合，联结文化交流纽带，吸引高端人才扎根上海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筑牢根基。

“激活演艺市场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。”许忠算了一笔账：按照上海文旅消费的持续增长趋势，到2030年，上海歌剧市场

线下观众有望达到200万人次，核心票务收入突破8亿元；依托歌剧IP开发的文创、周边、文旅融合产品等衍生收益预计超过2亿元，形成“演出+消费”的良性市场生态，成为上海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。

一座拥有歌剧的城市，不仅能为人民提供精神的滋养，更能以此为核心，吸引全球的目光与资源，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。事实上，这

样的效应已经在彰显。去年“拜鲁伊特在上海”系列非常成功，全世界的瓦格纳歌剧迷齐聚一堂，票房表现十分亮眼，通过精选精制的高品质艺术作品，为中国观众带来与世界一流同步的艺术体验，更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艺术之门。今年4月，“拜鲁伊特在上海”第二部巨制《女武神》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，届时又将吸引众多国内外观众专程前来。

全国政协常委高小玫：将课后托管纳入公共服务

让“三点半后”成为实践教育的补给窗口

供需两端皆存突出痛点

谈及6~12岁儿童的课后托管，高小玫直言，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后的看护空档，是很多家长的心头难题。她以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外孙女为例，学校仅提供一小时延时托管，时间太短了，父母还没下班，只能送托班。

在她看来，目前课后托管服务的供需两端均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。从供给端来看，学校实施课后服务本就力有不逮，课后看护除了完成必要的家庭作业，更需要以体能活动和兴趣拓展为主，而一线教师本就精力透支，额外承担保育工作更不现实。

校外社会化托管服务便成为家长无奈之下的选择。但高小玫调研发现，校外托管机构尚不普遍、收费高的问题，直接抬升了家庭养育成本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行业定位模糊。多数机构为避嫌教培，多数冠以“教育科技”的名称注册，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，从业人员

“双减”之后，小学下午三点半后的时间空了出来，但双职工家庭的“接娃难”问题却愈发凸显。长期关注这一社会问题的全国政协常委，民革中央原副主席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高小玫还有一重身份，一名10岁小学生的外婆。基于切身感受和深入调研，她提出：应将课后托管服务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范畴，构建专业的课后服务供给制度，让“三点半后”成为实践教育的补给窗口，让托管服务成为惠及民生的“小而美”项目。

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

缺乏基本职业尊严。高小玫印象深刻的是，外孙女所在的托班由一位三胎妈妈创办，租用会所场地，因单纯做托管不赚钱，只能靠健身等其他项目平衡收入。托班老师迫切需要的职业培训和清晰发展路径也无从谈起，导致人员流动率高、专业度难以提升。

“三点半后”是实践教育窗口

“双减”政策的实施，让小学下午三点半后的时间被释放出来，在高小玫看来，这并非简单的“看护空档期”，更应成为补齐我国实践类教育短板的宝贵时间窗口。她强调，课后托管服务的核心价值，远不止于“看住孩子”，更在于提供学校教育中缺失的实践教育——这也是“双减”政策推进

教育改革的核心初衷。

我国学校教育中，实践类教育长期薄弱，涉及体能运动、感知体验、社会化训练的内容严重缺乏。这一短板在AI时代尤为突出：靠体验习得的默会知识，正是AI的盲点，也是孩子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。高小玫认为，“双减”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，而“三点半后”正是政策补给实践教育的最佳时机。寒暑假、春秋假等假期，也同样需要专业的、具有实践教育功能的课后服务作支撑。

“实践教育的核心要求是多样、多层、个性化，这是学校无法单独完成实践教育的重要原因。”高小玫表示，若将课后托管的全部责任压给学校，既不符合

教育规律，也让学校陷入“将就办”的尴尬境地。

构建供给制度强化校外支持

“托管服务也是‘小而美’的民生项目。”高小玫提出，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，不仅是解决育儿难题，更是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、促进教育服务消费、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，应从制度构建和政策支持两方面入手，让校外托管服务走上规范化、专业化的发展道路。

她建议，首先要构建我国课后服务供给制度，将“课后服务”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，形成与育儿福利衔接的6~12岁儿童保育养育支持系统。要以托管服务和实践教育为制度定位，由学校延时服务与校外专业机构

课后日托服务、假期实践教育服务互补，构成完整的课后服务供给体系。同时，按兜底性、普惠性原则给予课后服务基本财政保障，比如购买服务、专项补贴等，“实现课后服务放量供给、自主选择、普遍可享”。

高小玫特别强调社区的作用，0~3岁婴幼儿照护已有补贴政策，6~12岁儿童的课后服务同样应获得公共服务支持。她建议参照养老机构“公建民营”模式，让社区为托管机构提供免费或低租金场地，满足日托就近服务需求，让托管扎根民生、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，还能释放促就业、促消费的双重价值。”高小玫指出，课后服务市场空间广阔，是顺应家庭养育需要、“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”的重要举措，也是“十五五”期间服务消费升级应当优先激活的领域。机构服务的人力来源充沛——在校大学生、退休教师、生活服务人员均可参与，既能提升专业度，又能有效扩大就业。